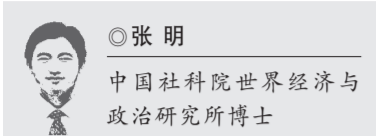


Column

■内外

暂行人民币自由浮动，如何？

——我看人民币汇改之三



●张明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博士

在2005年7月人民币汇改之前，人民币名义汇率显著低于均衡汇率，这早已成为国内外经济学家的共识。汇改至今，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升值了约17%，但由于自2007年夏季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以来，美元对欧元、日元大幅贬值，造成人民币对欧元及日元也呈小幅贬值趋势。但综合来看，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仍在逐渐升值。随着2007年人民币日均波动区间显著扩大，人民币汇率制度在事实上的盯住美元，的确已经转向参考一篮子货币的管理浮动汇率制。即使到现在，大部分经济学家依然认为，人民币汇率依然存在低估，需要继续升值。但是对最优升值策略选择，目前至少有三种看法。第一种认为人民币应该继续小幅、稳步、渐进的升值策略；第二种认为，人民币应该一次性大幅升值；第三种认为，不妨试行人民币汇率完全浮动。

人民币小幅升值策略自汇改以来一直在沿用。这样的升值策略，对出口行业的直接冲击较小，符合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经验，给中国出口企业留下了调整空间。当一段时间内的人民币升值幅度可以预测时，出口企业可以在与交易对手订立合同时，把人民币升值因素反映进去。由于中国的劳动力成本显著低于发达国家，要素价格存在管制，因此出口商品在国际市场上具有显著的成本优势，人民币小幅升值并不会立即削弱中国出口商品的竞争优势。随着人民币的不断升值，出口企业也有动力去压缩成本、升级换代、提高产品附加值，最终完成出口行业的结构性调整。

然而，人民币小幅升值策略对出口行业的较小冲击，是以对中国宏观经济的较大冲击为代价的。在这种策略下，国内外投资者都建立了人民币将会不断升值的单边预期。在市场认为人民币升值到位之前，无论是国际投机者还是国内居民都会争相将美元换成人民币，以套取升值收益。这导致中国外汇储备急剧增加，通过外

人民币升值策略已到了需要调整的阶段，继续小幅升值或者一次性升值的策略都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比较下来，暂行人民币自由浮动，从中长期来看可能是成本最低的策略。它看起来最为激进，但仔细分析，其实是可行且可控的，尤其是它有助于形成居民和企业避险意识，促进国内人民币远期市场的发育。

汇占款发行的基础货币陡然上升。虽然央行通过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发行央行票据、特别国债和定向票据等手段去冲销，但国内依然存在严重的流动性过剩，造成资产价格泡沫和通货膨胀。这正是2007年人民币汇改以来中国宏观经济面临的最大问题。于是有人戏称，在人民币升值的问题上，不能再继续摸着石头过河了，因为这是深水处，摸着石头过河必然会被淹死。正确的对策是放下石头，尽快游过深水区。言下之意应采取更加激进的人民币升值策略。

那么，目前人民币汇率是否可以一次性大幅升值呢，比如15%-20%？如果能够通过一次性升值使得人民币实际汇率达到均衡汇率水平，这当然是最理想不过的策略了。然而，人民币汇率一次性升值将会给中国出口行业造成沉重打击。中国出口商品的外币价格突然上升15%-20%，会使得中国商品相对于印度、越南、墨西哥等国家的出口商品处于价格劣势，进而造成中国出口显著下降，冲击经济增长和就业。此外，人民币的均衡汇率究竟是多少，始终都未达成共识，因此一次性升值到底能升多少，很难把握其分寸。如果升值幅度过高，则市场依然预期人民币会继续升值，热钱依然会流入。如果升值幅度过大，形成汇率超调，则市场预期人民币将会贬值，国内居民和国际投

资者都会把人民币换成美元，形成资本外逃，从而对中国国际收支和人民币汇率造成显著的负面冲击。正是因为人民币继续小幅升值以及一次性升值策略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才使得部分经济学家把目光投向人民币暂行人自由浮动。这种方法看起来最为激进，但如果仔细分析的话，其实是可行且可控的。

且让我们作一次大胆的思维试验。

假定从明天起，央行出其不意地暂时放弃干预外汇市场，那么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将会上升到什么水平？笔者估计，升值幅度很难超过10%-15%。这一判断建立在在市场中参与者的心理预期的基础上。首先，从目前境外人民币无交割远期外汇市场来看，一年期人民币远期汇率的升值幅度也就10%左右，这反映了境外投资者（其实也包括部分境内企业）对人民币汇率的升值预期。其次，就笔者对沿海一些地区出口企业相关数据的分析，在与外国进口商订立2008年贸易合同、普遍预期人民币汇率在2008年将会升值10%左右。可见，境内外市场参与者都对人民币升值幅度形成一个比较稳定的预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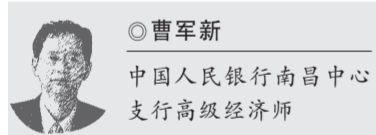
暂行人民币自由浮动策略的优点还可以列出几点：其一，人民币汇率升值到市场预期水平，有利于分化投资者的预期，打消人民币升值的单边预期，从而缓解热钱流入和流动性过剩；其二，由于出口企业在订立2008年合同时已经将人民币升值预期纳入其中，只要人民币汇率不大幅升值，对出口企业的冲击将是有限的；其三，暂行人民币自由浮动，有助于形成居民和企业避险意识，促进国内人民币远期市场的发育；最后，由于自由浮动仅是暂时，一旦市场表现异常，央行还可以恢复对外汇市场的干预，人民币自由浮动不至于失控。

笔者认为，人民币升值策略已到了需要调整的阶段，暂行人民币自由浮动，从中长期来看可能是成本最低的策略。当我们遭遇难以捉摸的深水处时，继续抱着石头渡河的危险越来越大，我们也不能期望着用尽全力一次性渡过深水区，更为理性的策略，是放下石头，沉着冷静地划水前行。

■不拘一格

目标：提升服务“三农”核心竞争力

——农行股改具体模式选择再议



●曹军新
中国人民银行南昌中心支行高级经济师

在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中，农行股改方案的酝酿、商议过程经历的时间是最长的。为解决“面向三农”与商业运作”的两结合难题，已得到相关部委和主管部门原则性同意的新方案采取一行的两制模式，核心是按照业务线重组的原则，把涉农业务和非涉农业务分离，成立独立核算的相关涉农业务事业部，从而实现上市。此即“事业部”模式。而去年九月有金融专家曾提出的一行两制另一思路是将县域支行按省组建子公司，则为“子公司”模式。

这个一行两制方案，仍存在一些不清晰的地方，尤其对涉农业务和非涉农业务分离的争议颇多。为此，笔者在此试将两个模式作一些比较，希望能有助于进一步厘清农行股改思路。

首先，从有效实现“两结合”的改革目标看，“事业部”模式不利于资金留驻县域和农村地区，相比起来，“子公司”模式可以将技术、人力和资金等资源专注于县域和农村地区，从而更贴近现实。

层层设立相应的涉农业务事业部，尽管在一定程度上便于涉农业务的单独核算管理，但却不利于股改“两结合”目标的达成，甚至可能落空。因为从过往十多年商业化改革发展进程中，农行虽然与其他三家国有控股商业银行相比，拥有较为完整的县域支行及农村地区网点，但一直受其是否立足服务“三农”而摇摆不定，大量从县域市场撤并机构和抽调资金，以至既在城市业务发展不够理想，又在广大县域市场和农村失去了竞争力和市场份额。因此，采取条线设置涉农业务事业部，很有可能成为从县域市场和农村地区地区抽资金流向城市的新通

道，加剧县域市场的“贫血”。经过近30年的发展，全国已经形成了东部——东北——中部——西部区域的县域经济差异性显著特征，“子公司”模式充分考虑了这种经济差异性特征，采取以省为单位，将县域支行集合，组成子公司，隶属于将组建的中国农业银行集团。借鉴法国农业银行集团设有专门经营农村金融业务的独立核算金融机构的成功经验，“子公司”模式也可以采取省——县间不设经营管理机构的方式，县级机构可以将技术、人力和资金等资源专注于县域市场和农村地区，不会使资金等资源流出县域地区，有助于以专业化要求分别集中精力做好做实城市业务和县域业务。其次，从历史经验看，涉农的事业部组织架构形式实际上类似过去和现在农行设置的专门的农业信贷管理部门，往往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交织在一起，弊端甚多，很可能把把经营形成的不良资产或亏损嫁接到政策性之上，最终由国家承担，因而存在较大的道德风险。

由于县域市场及其农村均是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薄弱环节，亟须国家金融政策扶持，而“子公司”模式由于专注县域市场业务，独立核算，有助于国家考核涉农信贷业务进行财政补贴，也有利于国家制定有针对性的金融扶持政策，如对农行实施差异化存款准备率等。

再次，从改革的便利性看，“事业部”模式，将涉农业务划出，看似简单，实际上涉农标准很难把握，操作复杂性较差。有人提出以去年央行推出涉农信贷统计制度的标准来划分，但其标准本身存在较大争议，其要反映的是宽泛意义上的涉农信贷业务，并不能将真正的“三农”信贷业务情况揭示出来，况且该制度尚在试运行。同时，这种以宽泛意义的涉农划分标准，可能将成为其随意将不应属于国

家政策补贴的业务调整为涉农信贷业务以套取国家补助的“工具”。

“子公司”模式将县域市场及其农村地区作为服务范围，可能存在相当一部分非涉农业务，但均属于国家重点扶持区域，整个改革步骤也便于操作，但改革成本相对较高。不过，根据农行年报，农行60%的网点、51%的员工分布在县域，截至2006年末，农行业务贷款和城市行管理的涉农贷款共计1.7万亿元，占全部贷款的55%。这样，将组建的中国农业银行集团大可以分成专门经营县域和农村业务与专门经营城市商业性业务的两个规模相当的独立核算子公司，可以形成有竞争的激励机制。

从上述分析看，“子公司”模式优于“事业部”，但“子公司”模式还须从以下几点方面作进一步的优化：比如，可以考虑将对农行业务系统以省为单位分出，成立专门经营县域业务的子公司。子公司采取二级经营管理体系，信贷等业务管理挂靠在农行业务分行，甚至考虑单设，业务经营在县级支行。农业银行集团总行设立相关涉农业务发展规划管理综合部，条件成熟时可以组建全国性公司，专门负责各省级子公司的业务规划发展、考核管理等，但不具体办理业务。这样，有助于考核和管理农行股改“两结合”落实，专注于县域业务和“三农”金融产品，防止资金过度向大城市集中。

比如，建立面向“三农”业务的认定、监测和区别于城市业务的考核体系，明确细化“三农”业务的范围等。

比如，考虑设立考核农行落实“两结合”原则的长期性的跨部门协调委员会，加强对农业银行集团内部的关联交易审计和监督，防止“三农”专项资金的转移和不良资产或亏损的转移等风险。

还有，选择有助于面向“三农”业务发展的战略投资者。包括引进以业务流程再造为导向的战略联盟，提升农行服务“三农”的核心竞争力等等。



■知无不言

曾经，我们离工业化仅一根头发丝之遥！



●袁东
中央财经大学教授

相比以欧美为中心的西方文明，至少到今天为止的过去几百年里，中国是个落后者，因而是追赶者。至于将来是否能够赶上甚至超过，恢复中国文明曾经的辉煌，则要看中国人对由先进变为落后，但不容否认的，如何在诸多方面是否有虚心学习和大胆革新的努力。所以，在今天人们怀疑、批评甚至指责欧美的技术、经济、政治、社会、文化机制与制度的有效性时，应该清楚的是，至少在现阶段，西方这套机制和制度仍有其先进之处，仍值得中国认真学习借鉴。

之所以强调这一点，是因为经过三十年高速增长的中国，在物质生活水平有所提高和自信心增强的同时，也出现了令人担忧的自负。比如，眼下在对美国“次贷危机”评析中透露出的有关对欧美资本市场和金融创新机制的否定，甚至对中国仍然落后狭小低效而充满管制的金融机制的肯定和维护；对欧美财产制度批判中所隐含的有关产权对经济发展的促进效应的怀疑甚至否定，并以此作为加大行政手段集中产业资源的借口；在政府主导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的成绩面前，规避甚至压制政治民主化改革，在远未培育起多种声音理性性辩论的公共机制与文化氛围时，却有恢复并强化只能有一种声音的文化压抑的迹象，等等。

上述种种倾向于中国发展前景为不利。就经济层面讲，中国民众的物质生活水平仍远未达到西方的平均水平；即便是在中国已经发展到离西方发达国家只有一步之遥，任何的自负、停滞、便意味着将被快速甩落。那位以研究经济史见长的美国西北大学教授乔丹·莫尔，在比较中国和欧洲技术革新史时曾总结说：中国人一度离统治世界只有咫尺之遥，接下来却渐行渐远”。并引用琼斯的结论强调：中国在14世纪离工业化仅有一根头发丝的距离。”然而，700年后的今天，工业化却是中国仍然没有完成的任务。

这段有关中国技术革新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评述，最值得当今的中国人细细回味。恐怕公元1400年是个现在看来最明显的历史分水岭，此时的欧洲开始了“文艺复兴”，从而随着哲学思想、文学艺术、政治变革、技术创新突破而逐步在科学理性的指引下步入了工业化的繁荣大道。而此前曾在农业种植、冶金、化学、纺织、水利、天文、时间计量、航海、造纸印刷、医学等诸多领域都有着欧洲人不可比拟的技术创新成就的中国，以1430年禁止一切远洋航海探险活动为标志，一切技术革新似乎完全停滞了。

这种由先进变为落后的更替，使得中国经济社会也由此领先沦为全球的尾随者。按照英国安格斯·麦迪森教授的整理与测算，就人均GDP比较看，公元960年的中国为450美元，而欧洲为422美元；1300年时的中国为600美元，而欧洲为576美元；到1700年时，中国仍为400年前的600美元，而欧洲却高达924美元；1978年时的中国为978国际元，仅相当于当时欧洲10972国际元的不到十一分之一；即使到了2003年，中国也仅相当于欧洲水平的四分之一。从1700年到1978年的278年里，中国人均GDP仅从600增加到978国际元，而全球平均水平则从615增加到4432国际元；1700到1820年在全球人均GDP年均混合增长率为0.07%、欧洲为0.14%的过程中，中国则为零增长，而1820年到1952年，在前两者达到0.93%和1.04%的水平时，中国则是-0.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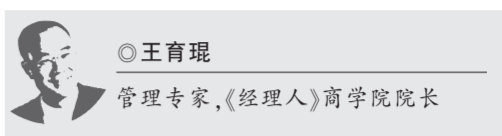
尽管这一经济社会先进与落后的更替，不能完全归咎于技术进步的落后和停滞，但不容否认的是，技术革新是富裕和发展的杠杆。正如没有1400年以后欧洲技术革新的快速进步和突破，就没有18世纪的欧洲工业革命以及他们现在的全球领先者地位一样，技术进步的停滞是中国经济社会在全球竞争中败下阵来以至落后到现在的最主要原因。说其是“中间原因”，是讲技术停滞还有其更深层的许多决定因素。而这正是现在中西方很多人士感兴趣并努力探求的领域。在众多解释中，我认为乔丹·莫尔教授的观点是最值得关注：中国技术变革主要是由公共官员与中央政府造就的，这种变革存在着弱点，即受制于政府的赞同和认可。只要政权支持变革，进步才能够发生。但是可以说，政府可以把握开关上，而私人企业不太可能循隙而入。”由于“大多数已确立的官僚机构对改变现状往往越来越厌恶，政府所造就的技术进步不太可能持续很长时间。当政府失去了推动技术进步的興趣的时候，奇迹就结束了。”特别是，在一个长期没有政治竞争的中央集权专制社会里，拥有无限权力的君主和文职官僚人员一起构成了保持现状并反对任何变革的既得利益保守势力。而任何重大技术革新都会引起经济社会以至政治变革。如此，在一个政府作用是独一无二且无可替代的社会里，倾向于稳定高于一切的保护政府怎么会支持技术变革呢？

恰恰是由于汉唐以及完全承袭唐制的宋代，在中央集权上仍保留了中央与地方的分权，皇权与相权的适当分离，尤其在唐朝，代表行政权力的相权也分成决策指令权、复核权与执行权相互分离的三部分，分属中书省、门下省和尚书省三个行政部门掌管，以防止行政权力被高度集中于宰相而滥用，或者因皇室剥夺相权而滥用，正是这种一定程度的政治竞争机制，才使得公元1400年以前的中国政府及官僚对变革尚失去兴趣，也才有了此间领先世界的技术革新成就。然而，正如历史学家钱穆先生所总结的：专就中国史论，汉以后有唐，唐以后却再也没有像汉唐那样有声有色，那样值得崇奉歌咏的朝代或时期了，那也是值得我们警惕注意的。”

如此看来，一时先进了，未必不会落后；对待先进者的问题，不能盲目批评指责，更不能拒绝学习借鉴和靠攏；只要有赶上先进，就不能轻言超过，更不能有任何自负；落后与先进交互更替的背后，总是有着垄断性还是竞争性政治的身影；没有私人领域理性扩张以及竞争性政治文化，落后者的赶超恐怕只能是良好的愿望。

■排沙简金

建震不垮学校，铸震不碎灵魂！



●王育琪
管理专家，《经理人》商学院院长

那是一幅怎样的惨烈景象！大雨如注，都江堰市聚源镇聚源中学的废墟上，求救的家属们匍匐在地期盼，国家救援队一到达旋即施救，可惜楼层已坍塌成一堆碎石，这支中国最优秀、装备最优良的地震救援队，只能靠最原始的办法：用双手在废墟上刨挖，结果只救出两名学生。一位国家救援队队员愤怒了：简直就是豆腐渣工程！混凝土里全是铁丝，根本不是什么钢筋！”这是一座建于1994年的建筑，后来又在其基础上拼接楼房，地震来袭，周遭楼房安然无事，而唯独它轰然倒塌。17个班278名学生被夺去了生命，另有11人失踪。

神色凝重的温家宝总理在聚源中学的废墟上，当着几百个绝望的家长，向被掩埋在废墟下的近300名学生三鞠躬。可以想见当时老人家的的心情。他是地质专家，知道这里离震中汶川还有110公里，而镇上其它建筑没有出现整体坍塌，偏偏这个教学楼在几秒钟就内坍塌了。哪怕再多支撑3秒钟，那些拥挤在出口过道的学生就能生还啊！

总理的关注，引来先后几批建筑专家到现场研究。有做志愿者的工程师认为，从废墟来看，钢筋很乱，有些还非常细，这可能是造成楼塌的主要原因。另有专家质疑，有关部门的防震标准在该楼建设时怎么形同虚设？

据了解，建设部早在1978年就颁布了《建筑抗震设计规范》。当在列明：当遭受高于本地区抗震设防烈度预估的罕遇地震影响时，不至于倒塌或发生危及生命的严重破坏。”而北川、汶川、绵竹、茂县和都江堰这里7度设防，九寨沟、平武、松潘和文县应属8度设防。可在汶川大地震中，为什么有7000多个校舍整体坍塌？为什么地震中死亡最大的群体是学生？学校怎么成了吞噬孩子生命的恶魔？

只要太阳还在照耀，可担忧的就不是天，而是人。超越限度，天也无法活人。不管可以找到多少借口和解放军为我们救助建房、分发救灾物资的情景，他们每天天亮来、天黑走，不吃一口我们的食物。我们现在只是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支援灾区建设是每一个中国人应尽的责任。

面对埋在瓦砾中的孩子，这个国度里每一位成人都应该忏悔。正是因为我们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因为我们只为自己的生计奔忙，才形成了一种唯利是图的社会氛围和文化，而这些正是豆腐渣工程得以盛行的土壤！每一位成人都有责任！唐山孤儿张祥青个人捐款1亿元建校舍。在央视震灾义演现场，他喊出了全中国人的心声：建最好的学校，建震不垮的学校”！张祥青，1989年开始创业，靠卖早点、做豆腐、养猪等家庭副业，他积累了一定的积蓄。2006年，荣程钢铁的销售额达到220亿元。张祥青用朴素的经营哲学引领一个小作坊完成了走向现代化企业集团的转型，成了世人瞩目的中国优秀民营企业家。我是32年前唐山大地震的孤儿，至今还能回想起解放军为我们救助建房、分发救灾物资的情景，他们每天天亮来、天黑走，不吃一口我们的食物。我们现在只是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支援灾区建设是每一个中国人应尽的责任。”他说。

在汶川震灾中心区域学校倾塌的一片废墟中，唯有四川汉龙集团援建的北川刘汉希望小学还孤零零地站在那里，483名学生和教师都安全撤离。由成都汉龙集团援建的其它4个希望小学，全都完好无损，没有伤着一个学生。

“什么也不能亏教育”，这是汉龙集团董事长刘汉的价值观。他不止出资建设，还躬身督学、监理，为建学校这样的百年大计工程，一次次地巡工，不止一次地地火、吵架，这才有了他所援建的学校完好无损。张祥青和刘汉，既让我们看到了危机深处，也让我们看到了希望：建震不垮的学校，铸震不垮的灵魂！张祥青和刘汉在关注教育的善举中，完成了自己的拯救，在灾难深重的时刻，也给了国人一种希望。他们把微薄的力量贡献给了中国教育。我们每一个中国人，也需要在关爱教育、珍爱孩子的实际行动中完成自己的救赎。

我们还应当向震灾大国日本学习。教育设施建设、教育投入机制、教师队伍建设等等要真正置于国家的长远发展之中。日本是真正把教育放在了第一位。在那里，学校通常是地震灾害的避难所，那里是最棒的抗震建筑。建议国家出台强制性的“教学楼”建筑规范，如教学楼必须框架建筑，柱子要多大，要多大的钢筋，多少根钢筋，都要有强制性规定，不准使用任何预制件，否则，无论怎么设计，给多少钱来建，都会是一句空话。

举一人之力、十人之力、百人之力，建一所、十所、百所、万所震不垮的学校，其实不难。难的是建亿万震不垮的灵魂！那些被压在废墟下的鲜活生命，或许将开启中华民族的火拯救。他们是地下的盐，让这个民族，让这个社会，让这个国家，让每一个人都开始变得有人情味，都会哭，会疼，懂得爱，懂得孝敬，懂得自尊，也懂得了承担。

我们每一个成人，都要像张祥青和刘汉那样敢于承担：建震不垮的学校！铸震不碎的灵魂！